

在革命现实主义道路上不停地跋涉

——试论周立波创作的发展道路

吴 肇 荣

革命现实主义道路,是无产阶级为了适应新的革命现实对文艺的要求,在马列主义思想光辉照耀下和批判继承过去优秀的文艺传统的基础上,而开辟的一条崭新的创作道路。这条道路以其鲜明的革命性和严肃的科学性,引导一切有志于献身革命的作家、艺术家投入人民群众变革现实的斗争,从中汲取激情和素材,努力创作无愧于时代的作品。当然作家的创作要达到革命现实主义的高度和深度,必须作长期不懈的探索 and 追求;只有在这条道路上不畏艰苦,不断跋涉的人,才能登上理想的高点。为人们熟悉的周立波,就是在这方面作过较大努力并取得显著成就的杰出作家之一。半个世纪以来,他的创作活动始终是沿着革命现实主义道路向前发展的。在这漫长跋涉的行程上,洒满了他的汗水,留下了他的足迹,记录着他的业绩、经验和教训。

一个作家选择什么样的创作道路,决不是件偶然的事;只有当某种创作道路符合他的要求和愿望时,作家才会选择它。现实主义的根本精神,是真实地描写现实;而革命现实主义则是以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具体地描写现实作为基本特征,以激励人们改造现实、推动现实发展作为目的。这个创作原则,符合马列主义的基本原

理,体现了革命人民对文学创作的要求和愿望,因而对献身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事业的周立波有很强的吸引力;他一经学习、接受这一创作原则,就坚持不懈地实践。当然,作家创作中的革命现实主义精神,是随着他观察、认识现实的眼力的提高和正视现实、忠于现实的勇气的增强而不断发展的,经历了一个由肤浅到深刻、由不充分到较为充分的过程。他也就在这个发展过程中逐渐成长和成熟。

早在一九二八年,周立波来上海求学,就开始了写作活动。一九三四年,他加入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从此走上革命的文学道路。当时周立波主要是从事编辑、翻译工作,为了斗争的需要,也“抽暇写作一些散文和论文”。由于他努力学习革命文艺理论,又多方面接受外国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左联时期的周立波,就接受了革命现实主义的原则,并以它来指导自己的评论活动。时值左联后期,抗日战争已经开始,他在文学评论中积极宣传创作应努力反映这一斗争现实,要求作家们“用彩笔来描绘这些先烈和勇士的可敬可爱的面貌,来赓勉来者,教育青年”^①。他十分重视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深刻性,明确提出,“只有对于现实有深刻的认识,对于事件和情境进行仔细的观察和估

量”，“才能写出真正感人的写实的作品”②，并认为，“为了洞察现实的现象，明辨历史的动向，我们应当熟悉世界和中国的现势，……不断地学习人类智慧的最大的成就——革命的世界观”③；但他又强调创作不能从观念出发，指出“不从抽象的观念出发，不从数字和概念出发，用艺术家的彩笔涂出生活的颜色，用艺术的手段表现生活和思想，使思想和生活在形象化的手段中活生生地再现出来，而社会的矛盾和发展也自然透露”④，这才是真正的现实主义文学。他还针对当时一些作者创作上革命热情高昂，生活基础薄弱的情况，指出“表现思想倾向，带着主观的勉强性，是文艺的失败的最大的根源”⑤，不赞成“小市民式的主观的理想家”脱离现实的空想。很明显，周立波当时是明确主张文学创作要深刻认识现实和真实描写现实的，并强调现实最根本的内容是革命的现实，是人民群众变革现实的斗争，这就抓住了革命现实主义的基本精神。周立波这些对于生活和创作的见解和主张，表明他在理论上已接受了革命现实主义的原则，这为他以后的创作打下了最初的思想基础。

然而革命现实主义不仅是个理论口号，更重要的是一个实践原则。一个作家理论上接受了这一创作原则，并不一定在创作实践中就能很好地实行。这是因为革命现实主义并不是一种写作技巧，而是一种指导作家认识生活、反映生活的创作原则；作家对它的真正掌握和实践，是以一定的思想条件和生活基础为前提的。也就是说，一个作家要能真正按照革命现实主义的要求，真实地描写现实，反映现实的革命发展，他必须以正确的态度深入革命斗争实际，熟悉作为变革现实的基本力量的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思想感情，并加以认真的分析和研究。这就向一切作家提出了一个与革命现实、与描写对象（主要是劳动人民）的关系问题；不解决好这个问题，即使他理论上接受了革命现实主义原则，

而实践上还是不可能真正走上革命现实主义道路的。由于周立波受过较长期的资产阶级教育，又未经过长时间的斗争实践的锻炼，从生活到思想感情与劳动人民有一定的距离，对于新的现实、新的人民，是“不熟，不懂，英雄无用武之地”，所以在延安文艺整风以前，他是没有很好认识 and 解决这个问题。作家在理论上接受了革命现实主义原则，而实际上却不具备实行这一原则的思想条件和生活基础。这种理论与实际，主观愿望与客观实践的矛盾，在他早期创作中有明显的表现。

周立波早期创作的作品不多，除了后收入特写散文集《晋察冀边区印象记》、《战地日记》里的一些作品外（这是抗战爆发后，他离开上海奔赴延安，途经华北抗战前线进行采访写的），只有六个短篇小说。其中《第一夜》、《麻雀》、《阿金的病》、《夏天的晚上》、《纪念》五篇，描写的是作者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四年间在上海西牢的一段生活和斗争，而《牛》则是他来延安后刚接触根据地新生活的产物。在作者的早期作品中，《牛》最具有代表性。

这篇小说写于一九四一年。其时周立波满怀革命热情从上海的亭子间来到革命根据地延安，他的生活“不但是经历了两种地区，而且经历了两个历史时代。”然而作家当时在“鲁艺”任教，钻到西洋名著中有些“迷惑”，“漠视了比古典作品所反映的内容要雄伟得多的眼前的工农兵的斗争的现实”⑥，严重地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他虽然也偶尔下乡，那只不过是短期作客式的去收集写作材料，对于劳动群众的生活、思想感情不熟悉，缺乏深切的体验和理解。《牛》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写的。小说描写的是延安农村贫农张启南爱牛的故事，意在表现根据地农民精神面貌的变化。从小说的选材和对主题意义的规定上看，作者热情反映革命现实的主观愿望和歌颂劳动人民新生活的倾向性是明显的，但

可惜这种良好的愿望没有建立在作者坚实的生活基础之上，没有与对现实的深刻认识和真实描写结合起来，也就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由于作者对劳动人民的斗争生活不熟不懂，他就很难把握时代的本质和抓住农村生活的根本性变化，“只能写写牛生小牛的事情，对于动人的生产运动，运盐和纳公粮的大事，我都不能写。”^⑦当然，革命现实主义并不排斥写日常生活小事，但它必须与特定时代的社会背景联系起来，赋予它深刻的社会意义。在这里，生活现象的真实与事物本质的真实是联系着的，是通过前者反映后者、揭示后者。然而《牛》不是这样，它脱离生活的本质真实，用大量篇幅记叙母牛生小牛的全部过程和描写主人公张启南对母牛小牛怜惜疼爱的心理活动，虽然呈现出逼真的生活景象，但母牛生产具有什么社会意义，此事与张启南由懒变勤的思想转变有什么内在联系，却没有揭示出来，因而未能反映出生活的本质特征和根本性变化来。周立波的早期作品，很注重对生活细节、生活现象的逼真描绘，而忽视对生活本质真实的揭示，这就使他的创作不但没有达到革命现实主义的境地，而且还存在某些自然主义的色彩。这个事实充分说明：深入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斗争，在思想感情上与群众打成一片，认真观察、理解生活，把握现实的本质，是创作达到革命现实主义的重要条件。

彻底结束早期创作上那种反映生活肤浅表面的局面，而坚实地走上革命现实主义道路的标志，是长篇小说《暴风骤雨》的出世。从《牛》到《暴风骤雨》相距七年时光，这是多么不平凡的七年！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并正在夺取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社会生活和时代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同志提出了文艺的工农兵方向，指明了作家与群众相结合的道路，为作家真实反映飞速发展的革命现实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特别是在这段

时间里，作家亲身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他根据党的文艺思想，回顾总结了过去，认识到要深刻反映伟大的时代，“除了改造思想以外，还要改变我们的生活。改造思想和改变生活实际上是不可分开的。我们要到群众中去参加斗争。”^⑧决心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周立波参加了八路军南下抗日支队，南征北战，行程万里，在枪林弹雨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散文集《南下记》真实地记录下这段生活和斗争经历，初步显示了作家深入斗争实际后所取得的思想收获和创作成果。一九四六年十月，他又奔赴东北解放区参加土改工作，与农民朝夕相处，一同战斗。由于认真地深入工农兵的生活和斗争，作家的思想感情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已经由原来的一个收集写作材料的生活旁观者，变成了现实斗争的积极参加者和群众的知心人。作家与革命现实、与表现对象的关系的这种根本性变化，使他有可能对急速发展的现实生活作深入的体察和理解，也使他有可能从生活中获得丰富的创作素材。这时，只有这时，作家掌握并实践革命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基础和条件才算具备，革命现实主义的优秀作品《暴风骤雨》才应时而生。

《暴风骤雨》与《牛》不同，它已不是描写现实生活的浮浅现象和表面真实，而是“打算借东北土地改革的生动丰富的材料，来表现我党二十多年领导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艰辛雄伟的斗争，以及当代农民的苦乐和悲喜……。”^⑨从脱离时代生活的本质，只描写生活的表面现象，进到真实反映一个历史时代的社会风貌、表现人民群众的历史命运，揭示现实的革命发展，这是周立波现实主义创作的一个重大进展和突破，表现出作家关注现实的充沛热情和洞察现实的深邃眼力。《暴风骤雨》描写的是解放战争初期东北农村土地改革的斗争生活。农民与地主的阶级矛盾，是当时国内的主要矛盾；土地改革就是

为了解决这一矛盾而爆发的一场革命的暴风骤雨，它的胜利是决定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一个重要条件。作家选取这样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题材，无疑表现出他对时代发展和人民命运的关注。然而小说的现实主义深刻性主要还不是因为选择了重大题材，而在于它对现实关系作了富有时代特色又具有历史内涵的深广描写，反映了一定历史时期革命的某些本质方面。同现代文学中一些描写农村生活的长篇小说相比较，《暴风骤雨》有自己出色的现实主义成就和特点。

小说最可贵的特点和成就，是它站在历史的高度看取生活，因而能根据实际生活提炼出富于典型意义的人物和情节，真实地再现现实关系，展示出一幅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农村阶级斗争的历史画卷。能以这样广阔的视野和深邃的眼力观察、反映社会生活，在当时的小说创作中是不多见的。小说以土改运动的开展过程为线索，逐步展开了对几个主要人物的独特身世、斗争经历的描写，通过他们的命运、遭遇来揭示当时的现实关系。作者以鲜明的阶级感情，用深沉有力的笔触，真实细致地描写了赵玉林四次被抓劳工弄得家破人亡的经历和长期过着衣不蔽体的生活而被人称之为“赵光腚”的景况；描写了郭全海的父亲被地主设下圈套陷害致死的惨景和小全海备受奴役的遭遇；描写了少女田裙子被地主杀害的惨状和她母亲因之悲愤失明的经过；描写了小猪倌吴家富的苦难身世和家史……这一个个浸透农民世代血泪和蕴籍他们的渴望、追求的生活情节和场面，集中地再现了旧中国地主阶级勾结帝国主义、官僚势力剥削压迫农民的历史真实。赵玉林他们在暗无天日的旧社会，始终“守着庄稼人的本分”、“不乐意向谁去低头”，在最艰难的处境下也不掉泪，鲜明地表现出被剥削被压迫的劳动者的仇恨和骨气。乡亲们在党的组织、领导下奋起四斗韩老六的曲折过程和与杜善人、韩老五的反复较量，更生动

地反映了农民的内心仇恨已转化为革命的行动。最后郭全海等人积极参军，带着翻身农民的昂扬斗志投入解放战争的洪流，则展示出农村土改与全国解放战争总局势的联系。这一系列真实的生活场面、情节、故事，由于被放置在中国人民奋起摧毁旧世界、创建新生活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背景下，并用土改运动的开展过程（发动群众、进行斗争、胜利结束）贯串起来，组织成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艺术整体，使小说成为一部中国农民苦难、觉醒、斗争、翻身解放的壮阔历史画卷。作品虽然只写了东北土改前后不到三年的生活，却表现了中国农民过去、现在和未来，反映出中国农村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历史性变革，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形势、任务和前途。小说在概括农民生活的深度、广度方面，都比以前的一些作品向前跨进了一大步。

小说另一个突出的特点和成就，是它运用正确的立场、观点，探索农民在社会大变革中思想、精神面貌的变化，有力地揭示了时代精神。与过去不少作品把农民当作消极力量描写不同，小说以极大的热情描写了农民的觉醒、成长，歌颂他们在革命斗争中的伟大作用。主人公赵玉林是个先进农民的典型，小说对他的觉醒、成长过程作了出色的描写。在旧社会他受苦极深，内心翻滚着翻身的渴望，当工作队一进村，与他初次接触时，他就深有感触地说：“你们再来晚一点，咱们都得死光了。”这是他觉醒的基础。当工作队员将革命的思想灌输进他的心田时，他那朴素的阶级爱憎很快升华为明确的革命意识，这时他就向小王表示：“这会想透了，叫我把命搭上，也要跟他（指恶霸地主韩老六）干到底。”运动刚开始，地主阶级的反动气焰还很嚣张，他无所畏惧，勇敢地站到斗争的前列；而分斗争果实时，他又毫无私心，处处为群众作想。正是斗争实践把这样一个本分老实的农民，锻炼成一个摆脱了狭隘的传

统观念束缚的先进战士，使这个形象概括了深刻的时代内容。赵玉林虽然过早地在战斗中牺牲了，但他那种迎着战斗烈火端着枪勇往直前的精神风貌，却深深地印进人们的心里，读者从中能强烈地感受到亿万农民渴望翻身解放的历史要求，和为之英勇奋斗的巨大积极性。郭全海是作为一个基层干部的典型出现在小说里的，他完整的英雄性格有一个从容的发展过程。在小说的第一部里，他是一个觉醒较早的农民，在四斗韩老六的过程中，已经表现出英勇积极、机灵正派的特点。到了第二部，作者更是把他放在斗争的漩涡中，通过挖浮财、起枪枝、抓特务及分马等情节，精心刻划他作为一个斗争的组织者领导者的才智和胆略。最后他克服家庭观念带头参军，更表现为青年农民的榜样。小说通过郭全海由奴隶成长为忠心耿耿、精明强干的基层干部的过程，反映了农民翻身解放，走上国家主人地位的历史性变化。老孙头是一个具有复杂性格的老农。他出身贫苦，深受剥削，因而憎恨地主，要求翻身；但他长期受奴役，加之以赶车为生，沾染了一些坏习气，因而又害怕地主威风，斗争中有顾虑，分果实又很自私；但随着斗争的深入发展，他的思想也不断进步。小说通过他曲折的觉醒过程，反映出绝大多数农民都能走上革命大道的必然趋势。由于作者把土改的开展过程与农民的觉醒成长过程结合起来描写，使作品激荡着一股农民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决心摧毁旧世界、创建新生活的精神力量。这正是时代精神的光华。

《暴风骤雨》问世后，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作为一个坚持革命现实主义的作家，周立波对解放后的新现实充满热情、敏感和探索精神；他的创作也就在对新生活的探索中求得新发展。刚一解放，作家面对党的工作重点开始由农村转向城市的新现实，就考虑“反映工人生活和工业建设”^⑩。一九五一年二月，周立波深入北京石景山钢

铁厂，开始了对一个新的生活领域的探索，于一九五四年八月完成长篇小说《铁水奔流》。这是建国后较早出现的一部反映新时代工业建设的长篇小说，它通过描写解放后的最初年月里，某钢铁厂在困难的条件下和复杂的斗争环境里修复高炉的故事，塑造了李大贵等新时代工人阶级的艺术形象。这些人物形象的突出特点，是忘我的建设热情和高度的当家作主的责任感，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的时代精神。《铁水奔流》是作家与新时代的群众相结合的产物，他在创作中对新人物、新世界的探索精神是可贵的。当然，任何对新事物的最初探索总难免有不足之处，由于作家对工人生活领域的生疏，加上深入体验的时间较短，致使小说存在反映生活不够深刻和人物形象不够丰满的缺点，但从中得到的经验教训对作家同样是可贵的。

创作中革命现实主义的深化，取决于作品反映现实生活的广度和深度的加强。鉴于创作《铁水奔流》的经验和教训，周立波很注意将对新现实的热情、敏感与对新生活的深入体验、理解结合起来，以加强作品反映生活的广度和深度。一九五五年，周立波将全家搬到家乡农村落户，潜心研究社会主义农村的新生活，使自己的现实主义创作具有更扎实的生活基础。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在湖南农村这块生活根据地上，周立波的创作又取得了新进展，长篇小说《山乡巨变》就是鲜明的标志。

《山乡巨变》同《暴风骤雨》一样，也是根据实际生活提炼出典型的人物和情节，真实地再现现实关系，展示农村社会大变革的壮阔图景。然而它在描写农村社会变革的广泛性、深刻性上，比《暴风骤雨》更为细腻、突出，有鲜明的社会主义时代特色。小说描写的是湖南一个僻静的山乡合作化的生活。合作化是一场社会主义性质的社会变革，它要

求农民抛弃世代相沿的私有制、私有观念，从根本上改变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因而是比民主革命性质的土改更为广泛、深刻的社会变革。《山乡巨变》根据这一现实特点，运用独特的构思，不着重描写合作化运动的过程和事件，而主要是精细描绘合作化运动中农村日常生活的真实图景，突现社会大变革的浪潮怎样波及生活的各个角落和深入人们的心底。小说以女主人公县干部邓秀梅入乡办社的活动为线索，展开了合作化浪潮对私有制和私有观念猛烈冲击所激起的层层波澜：党员刘雨生响应党的号召积极办社，而他那爱吃松活饭的漂亮堂客张桂贞在其富裕中农哥哥的挑唆怂恿下，却死劲拉后腿，最后闹得家庭破裂；老贫农陈先晋的子女在建社热潮的推动下，积极走上合作化的道路，而老信子却不肯与旧的生活道路决裂，因而一家“先进和落后摆了一个插花的阵势”；风趣的亭面糊嘴巴说要入社，心里又舍不得自家的竹山和树木，内心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精明而狡猾的富裕中农王菊生，为了抵制合作化，竟演出“装病”、“闹假离婚”的丑剧；破坏分子龚子元勾结张桂秋杀害耕牛，妄图制造混乱……作者正是从这五光十色的日常生活情景入手，探究合作化运动给农村生活和农民思想带来的巨大震动和深刻影响。然而不管反动阶级如何阻挡、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如何抵制，还是旧思想旧习惯怎样束缚人们的头脑，合作化的浪潮仍然滚滚向前，广大农民在党的正确路线、政策指引下，在集体化的优越性吸引下，都先后走上了合作化的道路，得到了精神上的解放。我们从作品对于在这场大变革中农民的相互关系、家庭矛盾、爱情纠葛、内心斗争的真实细腻描写上，清晰地看到：随着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变革，农民在生活、思想、感情、道德风尚、心理习惯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微妙的变化。这正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刻性之所在。很明显，《山乡巨变》在反映现实上，比之《暴风

骤雨》更能从时代的大局着眼，又从社会的细部入笔，将两者巧妙地结合起来，因而具有更强的现实主义的丰富性、深刻性。

《山乡巨变》同《暴风骤雨》一样，也是以极大的热情描写农民在社会大变革中的思想成长 and 变化，但它更注重探索人物的心灵奥秘，展现人物的精神历程。小说中有两个塑造得成功的老农形象，他们在合作化浪潮中的复杂性格得到了很生动的刻划。亭面糊自己分明是个贫农，但又怕别人瞧不起，总吹嘘“我也起过几回水”；土改中翻了身，拥护共产党，但谣风一来，就晕头转向，不能按党的指示行事；听了入社动员，连忙要二崽写申请，但又在破坏分子龚子元家贪杯误事……小说通过这一系列喜剧性情节，刻划了他充满矛盾的“面糊”性格。这种性格概括了深广的社会内容：饱尝旧社会的苦难，使他热爱新社会，但长期生活在小农经济中，私有观念重，一时又不能真正理解新制度的优越；旧思想旧习惯的包袱虽然沉重，但又毕竟接受了新思想、新事物的某些影响，具有一定的挣脱旧的精神束缚的要求，因而小说通过对这一复杂性格的刻划，就生动地反映出一个老农身上新旧思想的冲突及其消长过程，相当深刻地表现了一部分农民在社会变革中特有的精神状态和前进轨迹。陈先晋也是一个性格复杂的老贫农。他思想保守，恪守祖辈的遗训和世代相沿的生活道路。但他周围的生活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连他的子女、亲戚都选择了新的生活道路，因而引起他激烈的内心冲突。他在入社过程中欲前又止，一步三回首的精神状态，既反映了旧的思想、习惯对农民毒害之深，又表现了新的时代潮流对农民冲激之猛。象这样两个具有沉重因袭负担的老农，都先后走上了集体化道路，成为“以社为家”的积极社员，这就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潮流的不可阻挡和对农民巨大的吸引力，有力地揭示了时代精神。《山乡巨变》既满腔热情表现农民对社会主义

新生活的向往，又真实地描写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艰巨性、曲折性，使作品在反映生活上取得了现实主义的深化。

在《山乡巨变》问世前后，周立波还写了大量的短篇小说、散文，其中著名的有《禾场上》、《山那面人家》等。这些作品以真挚的感情、清新的笔调，反映社会主义农村的新人新貌，不断地探索新的时代精神；这种探索一直继续到他生命的最后一息。粉碎“四人帮”后，周立波壮心不已，打算创作两部长篇小说。一部是以农业机械化为内容的。可以想见，这部作品的完成，将与《暴风骤雨》、《山乡巨变》一起，组成中国现代农村发展的史诗般的三部曲。另一部是反映作家所亲身经历的抗战后期斗争生活的。为了更好地完成这部长篇小说，作者想先写点短篇作试笔，一九七八年写出了第一篇——《湘江一夜》。这个短篇以壮阔的气势，刚柔相济的笔触，描写我八路军一支前卫部队，在一夜之间出奇制胜横渡湘江的战斗，成功地塑造了我军高级指挥员董千的感人形象。由于作者能将抗战胜利前夕复杂的政治形势和我军夺取抗战最后胜利的昂扬斗志，熔铸在人物和情节里，使小说尽管只描写了一个生活横断面，却概括了较深广的生活内容，显示出作家短篇创作上的新进度。令人痛心的是，由于“四人帮”的长期打击迫害，周立波的身心健康受到极大摧残，终于一病不起，于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五日与世长辞，致使他晚年的创作计划未能实现。这对于热爱周立波及其作品的广大读者，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都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回顾周立波在革命现实主义道路上艰苦跋涉五十年的经历，人们不难看到作家创作

发展上最令人注目的特点，这就是：在正确的思想指导下坚持深入生活，与人民群众相结合，使自己在创作上不断获得前进的动力；以对新人物、新世界的热情和敏感，不断探索新的时代精神，使自己的创作能够不断地增添新内容、新色彩。正是这种忠于人民、忠于现实的可贵精神，使得作家的创作进展与时代发展的步伐一致。在漫长的创作生涯里，周立波将毕生的精力和才华无保留地献给了时代和人民，写出了几百万字的文学作品，以一系列广阔、具体、丰富、生动的社会生活的真实图画，艺术地再现我国从抗日战争到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时期所经历的历史风云，特别是深刻地反映了我国农村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到新民主主义社会、再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性变革，表现了中国农民从奴隶到主人的历史命运的伟大变化，为我国革命现实主义文学宝库增添了可贵的财富，为我们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人民将永远怀念这位无产阶级的忠诚战士和杰出作家。

①③ 周立波：《我们现在的文学》，《亭子间里》第4、2页。

②④⑤ 周立波：《文艺的特性》，《亭子间里》第26、23、26页。

⑥ 周立波：《谈思想感情的变化》，《文艺报》1952年第11、12期。

⑦ 周立波：《后悔与前瞻》，《解放日报》1942年4月23日。

⑧ 周立波：《生活、思想和形式》，《文学浅论》，第3页。

⑨ 周立波：《“暴风骤雨”是怎样写的》，《文学浅论》第110页。

⑩ 周立波：《“铁水奔流”的创作》，《文学浅论》第115页。